

# 廉洁奉公 鞠躬尽瘁

## ——刘鹗治水的故事

施向平



刘鹗画像

刘鹗,汉族,江苏丹徒(今镇江市)人,寄籍山阳(今江苏淮安)。他在文学、治水、医学、甲骨文研究等方面具有突出成就。《老残游记》是他的代表作,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,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世界文学名著。现已翻译成英文、法文、德文、俄文、日文等多种文字,印行版本超过186种,流传甚广,影响深远。据说

刘鹗出生之际,其母朱氏梦见了大鹏,因此给刘鹗取名梦鹏,乳名鹏鹏,字云抟。后来刘鹗自己改名“鹗”,字铁云。鹗是水鸟,说来凑巧,身处“棋局已残”的晚清,刘鹗的命运正是因为治水而出现转机的。刘鹗担任侯补知府,负责黄河治理。他在治水期间,廉洁奉公,不徇私情,任劳任怨,并以自己的治水理念和才华,取得了治理黄河的辉煌业绩。

### 一、勤学苦练 临危请缨

千百年来,黄河水患一直是老百姓的灾难。一旦黄河改道决口,多少的村庄、农田被淹;多少的道路、桥梁被冲垮;多少的生命被吞没。清光绪十三年(1887年),郑州黄河段决口,河道断流,河南、安徽、江苏二十多个州县被淹,洪水直注洪泽湖,有东冲下河南灌扬州之势。清廷派大员协助河道总督和地方政府治理洪水,可前前后后忙了一年多,决口也没有合龙。

此时,32岁的刘鹗已经捐得同知衔,满怀忧国忧民的情怀,挺身而出,来河南拜见吴大澂投效河工。刘鹗出生于宦宦之家,父亲刘成忠进士出身,曾在总理水利局任职半年之久,后担任河南汝宁府知府,在清朝汝宁府所辖地区正是深受黄河水灾之苦的地方,也是朝廷治水的重点之地,刘成忠在汝宁治理黄河方面有了丰富的经验,并撰写了《河防刍议》。刘鹗参加乡试落榜,后经商失败,便在淮安潜心研究测量、算术、绘图等方面的知

识,特别是苦心研读父亲的治 waters 学说,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独到见解。吴大澂佩服刘鹗的治水才学,对他委以治水的重任。刘鹗采用了“筑堤束水,束水攻沙”的治水策略进行治水。其间,刘鹗亲临工地,“短衣匹马,与徒役杂作,凡同僚所畏惮不能为之事,悉任之”。当年冬天,郑州黄河段决口合拢,从此刘鹗治水“声誉乃大起”。

### 二、躬身测绘 不辱使命

吴大澂奏请朝廷,成立善后局,主要负责测绘河南、直隶、山东三省的黄河河图。任命刘鹗、冯光远、董毓琦三人为提调,采用新法分段开展三省黄河全图测绘工作。自阴历四月开始,三人会同20多位精于测绘的技术人员“终日管窥蠡测,奔波河干,与波涛相出没”。当时黄河下游的黄河治理由张勳果负责。在张勳果的幕僚中,有个算学家贾步伟,他与李壬叔(善兰)齐名。某次黄河下游堤工勘测,勳果为了慎重,请贾去复查。贾回报堤工宽度较下游签呈增加约一倍。勳果闻报大怒,向刘鹗问责,拿出贾步伟的回报数字,责令复查。刘鹗遵命复查后,原来勘测并无错误,便去向贾请教。贾说你测量计算错了。刘鹗拿出算草复核仍不错,又以算草向贾老先生请教。贾看后说:“你计算方法不错,不过标杆立的不对。”刘鹗问贾:“标杆立在何处?”贾说:“未立标杆,系以对河宝塔为据。”刘鹗按照贾所说的重测,得数果与贾相同。但实测,宝塔离河岸尚二里余。于是,刘鹗向勳果说是贾老先生测错了。勳果又请贾问,贾说他不会错,愿与刘鹗打赌,立竿重测。勳果说不必立竿测量,直接派人拉绳子实地丈量,看究竟谁对。贾问刘鹗:“你错了,输什么?”刘鹗道:“错了,辞下游提调不干。”贾说:“好我错了卷行李。”丈量结果出来了,果然是贾错。这位耿介的老先生终于卷起行李,留书不辞而别,勳果派人去家里请也不回来,一时在济南风传刘鹗赴走贾步伟的笑话。刘鹗算学之名,从此十分响亮。

就在这一年(1889年),刘鹗在山东沿黄河一路勘察,直到黄河入海口。在实地勘察的基础上,结合查阅沿黄各县志以及河工资料,于次

年(1890年3月)完成全部调查测绘工作。期间,刘鹗耳闻目睹了许多,如黄河山东段有四次大的决口漫溢,“一漫于韩家垣,再漫于大寨,三漫于纸坊,四漫于张村”。其中,韩家垣位于黄河尾间的利津县,黄河在此决口后向东由毛丝坨入渤海。这是1855年黄河改道利津入海后,入海流路第一次改道。刘鹗将此一一记录下来,还对河道走向、接纳支流情况、两岸堤坝等水利工程情况作一一记录。

### 三、敢于直谏 革除弊政

刘鹗目睹水灾给人民带来的灾难,心情极为沉重。他在给易顺鼎的禀牍中写道:“黄之大汛之际,一千余庄淹没水中,举家被难者,不知凡几。目击心伤,惨不忍言。”1889年阴历九月初三,刘鹗实地勘察利津铁门关、韩家垣两处河门情形后,回到利津县城,他给当时的山东巡抚张曜呈送了一份禀牍,首先对张村、大寨决口合龙表示祝贺,并劝张曜采用王景治河的办法,以建“神禹之伟绩”。随着禀牍,刘鹗把刚写好的《治河五说》一并附上。刘鹗在《治河五说》中开门见山提出:“山东河患所以日甚一日者,实由河身愈垫愈高耳……今年割济阳以下数百庄以与河矣,而河患更烈。”用实践说明“废民埝、宽河身”的做法不可行,并提出了“修缕堤以攻积淤”、“播支河以消盛涨”、“改河门以就便捷”三项具体办法。1890年3月,刘鹗来济报到,开始在山东办理河务。刘鹗虽然是宦宦子弟,可是并无衙内作风,在河工现场,他“短衣匹马,与徒役杂作。凡同僚畏惮不能为之事,悉任之。声誉乃大起”(罗振玉《刘铁云传》)。据刘鹗夫人茅氏叙述,有一天,狂风暴雨,刘鹗外出巡河,通宵未归,家人急得不得了。黎明雨住,他才满身泥泞地回到家。原来,当夜黄河有两处决口,刘鹗亲自雨中指挥抢险,最终转危为安。张曜有感于刘鹗的敬业干练,遂任命其为黄河下游提调官,到任后,他力排同僚“不与河争地”之说,主张“筑堤束水,以水刷沙”,并撰写了《治河五说》阐述治河主张。

刘鹗在山东治河三年,未遭决成灾,“河工冠于诸省”。根据山东河道窄的特点,除了加强

两岸堤防外,刘鹗还提出了分与疏的治河主张。他认为山东黄河两岸大堤不够坚固,河道又窄,水很容易漫决为患,因此需有分水的设施。他派人在齐河赵庄、刘家庙和东阿陶城铺各建减水闸坝一座,以防溢涨。他说:“治河如治病,泛滥冲决,此河之病也,淤滩沙嘴,横亘河流,此又致病之由也。”他用平头圆船五十只,每船十六人,各带挖沙工具,将河中的淤滩沙嘴随时挑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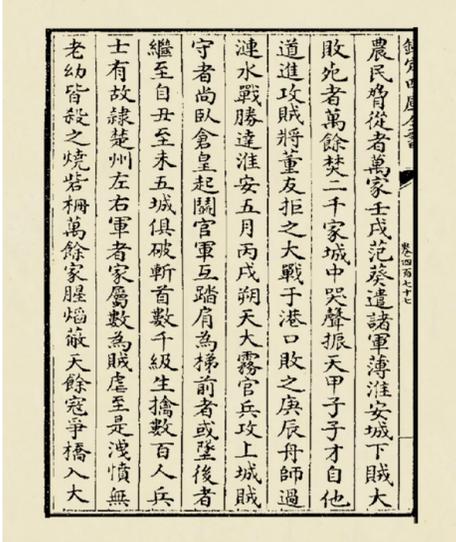
### 四、以身作则 反腐倡廉

刘鹗是清末四大谴责小说之一《老残游记》的作者,人称反腐作家。他揭露官场中的腐败,揭露官场中刚愎自用坑害老百姓,使老百姓蒙冤受屈的所谓“廉吏”。现实生活中,他忧国忧民,同情遭受水灾的平民百姓。庚子之乱,京城粮荒,饿民遍地,刘鹗进京参加赈济,自出12000两白银,其中7000两取自淮安家中,5000两借自朋友。刘鹗在山东治水期间,以身作则,反腐倡廉。黄河两岸堤防加固,建设减水闸坝,涉及许多建筑工程。有一次,他通过上海一位姓陈的朋友的关系,购买西洋水泥,为了弄活价格,他进行多方打听。他想,无数的灾民生活在穷困潦倒之中,每一分钱都必须用在刀口之上。当这位姓陈的朋友肆意抬高价格并对他进行贿赂时,他严词拒绝,并怒斥道:“发国难财的人是真小人!”最后,这位姓陈的朋友羞愧难当,以廉价出售了西洋水泥。有了这些水泥,刘鹗顺利地在齐河赵庄、刘家庙和东阿陶城铺各建大型减水闸坝一座。

刘鹗在水利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,治水期间还绘制成功《豫直鲁三省黄河图》,“全书五册,一百五十篇,合之则一图”。这是中国第一次用近代技术实测的黄河图,并注有经纬线,经线以北京为本初子午线。呈光绪帝浏览后,命名《御览三省黄河图》,现存于故宫档案之内。他还著有《历代黄河变迁图考》等。刘鹗于1895年秋冬间被保荐到北京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考验,以知府任用。至此,刘鹗在山东办理河务工作结束。

# 淮安古城的圩堡关城

徐爱明



《宋史》中的淮安“五城”记载

最终被消灭。可是围寨的设立,不单单是民众自卫的手段,亦是“辅军势、折贼锋”的措施,而且是与城郭内外互相配合,共为一体的方式和办法。咸丰年间,捻军气势正旺。咸丰九年(1859)六月初,袁甲三来到淮安任漕运总督,建议于城外建立围寨,作为防备。他说:捻军将来,“筑圩方能堵御。河下人烟稠密,甲于他处,万一捻匪东窜,何以御之?”并云:“清江应筑圩守御,彼有河督,庸庸我谋。城外地方则有藉诸君。”当时还派他的幕友徐云溪与河下人李元庚出城观察,大约是实地测量搞个预算。他们用一根20丈长的绳子作工具,从小坝起,西至泰山殿止,向北至盐河边上,向东至礼字坝新城西北隅止,由新城西北隅至广福桥过河,由三岔河至小坝止,绕了一个圈,进行丈量,预计筑圩二干丈有奇。并打算建圩十座,包括过河水门三座。后来袁甲三又派张小圃观察、张汝梅州倅,与李元庚等再次实地考察。不久,袁甲三调走。当时人们习惯了持续相承的太平时光,悍于兴作而未实施。

咸丰十年(1860)二月初一日,捻军窜至板闸,河下,时城门已闭,坚不易入,即于河下焚烧杀戮,抢劫劫掠。据程秀峰记载,男女大小有册可稽,死逾千人。至于湖嘴之南北,白酒巷、花巷、杨天爵巷、估衣街、二帝阁东西,烧毁房屋不计其数。河下庙宇被烧毁不少,捻军将天兴观前三官殿各窗榻堆积后殿中焚之。遂使丈六金身立时消灭。旁及文昌宫、斗姥楼二处,惨不可言。于是建筑围寨的风气兴起,淮安城周围纷纷筑围寨:一是筑于运河东堤,南起下一铺,北至北角楼的旧城西门外长围;一是起自新城东北角,转属城东的下关围;一是起自旧城南,环龙光阁,属之城南的南门围;依附于关厢而筑的,则有河下围、河北围,而制作修整,防守严密,则以河下围为最。当时官府派官派兵四处防守,而且是按地段派专人负责。河下片的防守是山阳县丞叶廷眷。咸丰十年闰三月就取,他一见河下惨景,连忙入城,痛哭坚持要在河下筑圩。淮安知府顾思尧同意了,并亲自监工。当时一筑筑圩,一边屡屡告警。人们怕再次被焚掠,踊跃参与工程。先用十几天筑好了基础,接着加高,到了秋天终于完工。建成功的河下圩,以天然的运河、西圩河、市河为濠,依濠筑圩。北面东起新城城根,西至西圩壕;西边南起运河边,北至市河边;南面从湖嘴古故里起至泰山殿止;东边依托原三城和萧湖。周长八里有奇,高五尺。新筑成

的河下圩只有五个门,运河堤边有其二,东南门在小坝,名曰“古故里”,西南门在泰山殿附近,额以“重门管钥”。这两个圩门,是前署宿迁知县胡容本按照顾知府指示所筑,均有城门楼榭,上边还筑有圩垛。正西在八佛庵前,两个人们至今仍称之为“西圩门”;北圩门在程公桥上,人即以“程公桥圩门”名之;东北在礼字坝,名亦久佚。北面有六个水门:曰回澜洞、曰沙坝、曰殷家码头、曰花巷、曰药师庵、曰毛家渡。南面也有六个:曰小坝、曰湖嘴、曰上一铺、曰中街、曰三板桥、曰四板桥。这些现在基本上都找不到遗迹了,甚至连名字也无人知晓了。此外,还有炮台八座。新筑的圩子比预想的缩水了不少,周长由二干丈变为八里多。一里是150丈,合1200多丈。但扩大了范围,原来不包括在内的整个萧湖全部囊括其中。

圩子建成以后便立即显现效果。同治元年(1862)正月到四月,捻军又来,不能攻入圩内,只在圩外掠劫焚烧,圩内人民岌然不动。圩外附近居民很多搬到圩内住,也躲过了这一劫。这次前后有三个月之久,官民未受损失。同治七年(1868),赖文光到了淮安,也无法下手,经过下关,刘伶台而去。河下安然无恙,皆圩寨之功,正如古语所云“有备无患”。河下是淮安的商埠,众商云集,十分繁荣。当年地处运河与淮河之间,是漕运要道,盐运津梁,地理位置极为重要,很久以前就有人建议在这里筑城。明朝嘉靖年间,倭寇闹得很厉害,淮北盐的集散中心河下,更是倭寇袭击和掳掠的目标。商人之间、子嗣于淮,积极组织状元兵抗倭,在竹巷建立御倭屯瞭所,和其他防卫设施。在当时御倭的形势下,修城、筑城是一种风气。南边扬州筑外城,宝应筑城,西边泗州修城,北边临清筑外城。为了保卫居民和盐商们的利益,曾经准备在河下也筑一座城。郑若曾《筹海图编》卷之六《直隶事宜·江北诸郡》记载,闽县知县仇俊卿云:“淮郡西湖嘴,正人烟稠密处,一遇寇至,搬移流寓,况二城所容有限,欲将西湖嘴另筑一城。”可能在未得到官府正式认可之前,沈坤已经开始做了。但遭到淮安知府反对,说沈坤“筑郭绝循道自固”,阻绝交通,连淮安府通判经过也不让通行。通判回府以后,报告知府范祺,范大怒,马上命人将沈筑的“郭”推倒。案,郭就是外城,城外大廓,实即防御工事土圩子,大约就是沈坤已筑好部分圩子。后因官府认识分歧,加之“财力俱有未便”,才有联城之筑:“聊将夹城中间联络为道,一自新城东南角楼起,旧曰城桃花营,一自新城西南角楼起,抵旧城北水关。”就这么一耽搁,从嘉靖三十八年(1559)到咸丰十年(1860),整整耽搁了300年。

河下圩与一般的县城差不多大,与稍晚新筑成的清河县城差不多大。清江浦划给清河做

县城,一直没有城池,咸丰十年焚烧比河下还要厉害。光绪《清河县志》记载:“漕运总督吴棠始建于城运河南岸,凭河守险,是为清河新县城”,“经始于(同治)三年之春,至四年秋而工竣,计长1200余丈”,合4公里多。

淮安城外也普遍地修建围寨。城东十余里石塘筑有石塘围,城东四十余里的车桥筑有车桥围,城北二十里的席桥筑有丁家围,城北四十里的钦工筑有钦工围,城东北十余里的季桥筑有季家桥围。这些围寨的布局筹划、组织实施,常常逾年而后定。每当警报到达的时候,乡亲们往往相率运粮运物,驱牲畜进入围寨以求确保自己的安全;而淮安郡城亦借以城外的附郭围寨为外卫,城池周边十里范围内的人畜、物资、粮食充足于城中,守城官兵、士民亦能够更加从容地修缮防守,人心也就安定了。后来南北荡平,投戈日久,附郭之围或残缺不完,在乡镇者或犁而为田。

其实,淮安围寨(圩堡)的历史要更早,宋元时期就频繁出现。宋朝自靖康之变后,楚州民众依托当地多水等有利地形,自发组成山水寨,以此保护人身财产安全。山水寨的人员既有楚州地方乡绅土豪,也有广大劳苦大众,如下宁的楚州岗北里水寨,“下宁者,楚州五湖中捕鱼人也。初,宁聚集捕鱼人。后又聚强壮,仅有余千人在湖中岗北里为寨”。下宁的水寨最早即是由一群捕鱼人建立的,后来在此基础上又吸收了各阶层强壮之人后,使得自己的水寨发展壮大,达到千余人。宋金战争期间,山水寨民兵为防御楚州做出了重要的贡献,他们配合南宋正规军,保卫并收复被金军占领的楚州以及其他失地,如:建炎四年(1130)赵立防守楚州之时,便与宿迁水寨首领赵琼相互配合,联合击溃金军;隆兴二年(1164),高邮军水寨严守则配合官兵收复了楚州以及宝应县,并且还活捉了金军将领,可谓大获全胜。除了配合官军之外,山水寨民兵也可以独自参与战斗,并取得胜利,如:建炎四年参与楚州保卫战的赵琼,即率领水寨民兵二百余人,趁着夜色偷袭淮阴清河口的金军运输船队,并且收获颇丰;同年,另一支山水寨在统领郭昇的指挥下,以一千余人收复了涟水军城,取得了不小的胜利。

《宋史·叛臣下·李全》在记述平定李全之乱时记载道:宋绍定四年(1231)五月,赵范、赵葵率领步骑十万大军直逼淮安,杀死贼兵万计,焚

毁二千余户,城中哭声震天。淮安的五座城全被攻破,斩首贼兵数千,烧毁营棚万余家。这时淮北贼兵来支援,舟师又予以剿击,烧其水栅,平夷五城的余址,贼兵开始害怕。其中提到“淮安五城俱破”和“夷五城余址”,而吴玉搢在乾隆《山阳志遗》中叙述“李全乱淮本末”时,在“五城尽破”后来注曰“五城不知何指”。近来有研究者认为:“五城”可能是指旧城(大城)、内城(子城)、新城、南堡城(即明清时期的南锁关)、河北城(三角城)。这个观点目前来说,只能说是猜测的结果,但“五城”中除旧城、新城外,南堡城当然是围寨(圩堡)应当说是毋庸置疑的。“南(城)堡”在《元史·伯颜传》中也有记载:至元十一年(即南宋咸淳十年,1274)丞相伯颜领兵伐宋,调淮安都元帅李鲁欢、副元帅阿里伯,带领着自己的部队溯淮而进。九月戊寅日,元军在淮安城下会师,伯颜派遣新近归附的官员孙嗣武敲着城门大声呼喊,又用箭把书信射进城里,劝谕守城将领投降,都不回答。庚辰日,招讨使别里迷失在北城西门列阵,伯颜和李鲁欢、阿里伯亲自来到南城堡,指挥诸将长驱直入登上城楼,攻克了南城堡,宋朝败兵想逃奔入大城,元军追击到城下,杀死了数百人,于是平定了南城堡。同治《重修山阳县志》卷二十一“杂记二”有所记述。可见“南堡城”就是“南城堡”,也即明清时期的南锁关,是淮安城南的重要关卡,亦为淮安城的“五关”之一。



宋代淮安“五城”概念示意图